



上海  
老  
作  
家  
文  
丛



徐中玉  
文论自选集

I0-I3  
I4

10-53  
54

上海老作家文丛

徐中玉  
文论自选集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中玉文论自选集/徐中玉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1  
(上海老作家文丛)

ISBN 978-7-5321-3574-5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文艺理论-中国-文集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③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0-53 ②I206.2-53 ③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4029 号

责任编辑: 丁元昌  
特邀编辑: 高彦杰  
美术编辑: 王志伟

徐中玉文论自选集

徐中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363,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74-5/I·2728 定价: 4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一辑,共12种,包括:王炼的《执著追求录》、任大星的《婚誓》、孙光萱的《于细微处见功夫》、朱鹭的《舷窗集》、李济生的《怀巴金及其它》、邵伯周的《平凡的旅程》、徐中玉的《文论自选集》、徐开垒的《新时期文选》、钱春绮的《十四行诗》、曹阳的《情系万家灯火》、廖晓帆的《欢唱》、燕平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以姓氏笔画为序)。这12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09年9月

# 目 录

我的简历·····	1
发扬艺术民主 促进创作繁荣·····	1
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	15
文须有益于天下·····	27
论顾炎武的文学思想·····	31
“言必中当世之过”·····	52
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	69
妙算毫厘得天契·····	90
文章且须放荡·····	105
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及当代趋向·····	127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137
重印《刘熙载论艺六种》序论·····	172
中国文艺批评所受佛教传播的影响·····	188
中国文艺理论中的形象与形象思维问题·····	216
孔孟学说中的普遍性因素与中国文学的发展·····	261
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	270

我们应向鲁迅学习其批判精神与读书方法·····	312
“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333
再谈“重新从头学起”·····	346
六十多年我与本国语文关系中的感想·····	351
求学过程中三点粗浅体会·····	365
《大学语文》教学应如何积极改进·····	382
《应用文写作课》应如何发挥教学的作用·····	389
《应用文写作》如何发挥教学的作用·····	395

## 发扬艺术民主 促进创作繁荣

——读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

艺术作品的好坏,究竟应该由谁回答,要谁批准,什么人说了才可以算数? 这些问题,向来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回答。封建贵族老爷和资产阶级大亨,以及他们在文艺方面的代表,当然认为好坏的评判权只能在他们自己手里,群众不过是一些粗人、俗人,哪有插嘴的份。群众也有眼睛,也动脑筋,对他们接触到的艺术作品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由于几乎被剥夺掉了一切广为发表的权利,以致他们的观点很少能为人们知道。到了新社会,是非、好坏,似乎很快就能辨别清楚,然而事实亦不尽然。革命是在旧的基础上进行的,剥削社会的旧思想旧意识旧习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有时由于缺乏经验,路线上存在问题,许多旧的东西还可能在貌似革命的名义下沉渣泛起,造成混乱。十八年前周恩来斩钉截铁地指出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这都是针对当时文艺界现实存在的弊病而发的,有些同志身子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嘴里虽也常念“群众、群众”,可是接触到具体问题,要评判艺术作品的好坏时,头脑里种种旧东西就又冒出来,口口声声的群

众观点一下子便不翼而飞了。群众回答的、群众批准的，都不算数，群众喜闻乐见的，他们照样可以不批准。他们似乎很尊重领导，却连周恩来那么剴切的告诫都完全不听，把周恩来的讲话“打入冷宫”。这些人实际上是在，做官当老爷，口头所说好像正确的一些话全是假的。后来“四人帮”欣然接过这些假正经，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一段时期里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竟使人们厌烦得连收音机都不愿打开。文艺界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创作怎么能不萧条、冷落！

周恩来这些话都是真理。现在我们要求艺术繁荣，必须坚持这个真理。这些话是实践的结晶，艺术史上成功的经验可以为它作证，失败的教训也不断从反面给它提供证明。当代文学的实践可以继续检验它，古代艺术的实践早已对它进行过长期的检验。尽管在长期封建统治的社会里，不可能在这方面留下很丰富的材料，但就我们接触的部分材料中，也已能为这个真理提供不少有力的证据。学习研究这些材料，对今天还是很有启发，很有益处的。

## 一 富有实践经验的群众最 有艺术创造力和鉴赏力

从现有材料看，孔丘是在写作上看到集体力量的第一人。《论语》里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明》）。

为完成一个外交文件，有草创的人、参加讨论的人、进行修饰的人、再作润色的人。孔丘有意详述这一过程……列举人名，显然表示了肯定和赞许。这些人都是士大夫之流，并非劳动群众，但众人的智慧比单独一个人强，孔丘是看到的。看到了而又对人指点



出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一种合理的、很有价值的思想。这种思想显然只能从实践中得来。

曹植是建安文学名家。他写信告诉朋友:“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但他并不妄自尊大,目中无人,既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也坦白承认:“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任何人著述不能完全没有一点毛病,作者无论多么高明,别人还是可能发现他的某种错误或不足之处。而自己虽然已有二十五年写作历史,仍有很多“不善”的地方,承认人们完全可以讥弹自己的文章,觉得这有助于及时改正自己文章中的缺点。他以陈王之贵,而有如此客观的态度、足见在长期写作实践中确曾体会到不少真理,特别难得的他还有这样一种思想:“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文选》卷42:《与杨德祖书》)。如果说能够讥弹其文的大抵还是同他过从亲密的学士文人,那么在这段话里所说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该包括许多地位低得多,数量大得多的中下层人民的思想了,不要以为像曹植这样身份地位的人就一定不会有某种民主的思想。

东晋画家戴逵《字安道》。又善铸佛像和雕刻。他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但古制朴拙,不够感动人心。为了改进,他偷偷地隐坐在帷幕之中,秘密听取群众的议论,他对所听到的议论,不论赞赏还是批评,都仔细加以研究,经过三年之久的思考琢磨,他终于刻成了一座理想的佛像。(唐张彦远:《历代各画记》卷5)。

唐代画家周昉(字仲朗),德宗时要他为章明寺画壁,画时成千上万的人赶去观看。其中有些懂行的观看时或称赞其巧妙或指斥其谬误,他注意吸取这些意见,随时加以改定,开头意见纷纷,一个多月后,再也没有人批评了,一致赞叹他画得神妙(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5)。

以上著名的例子表明这些作家艺术家有从善如流的雅量,但根本的一点,则是群众具有无可比拟的艺术创造力和鉴赏力。这些作家艺术家不可能一开始就有这种雅量,乃是在创作实践中真

正体会到了群众的惊人创造力和鉴赏力往往胜过自己，才会逐渐养成这种雅量。

群众为什么能有无可比拟的艺术创造力、鉴赏力呢？一句话，因为群众最熟悉生活，而生活正是艺术创造的源泉。群众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各种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都直接参加过，亲自经历过，经常在打交道。为了吃饭、谋生，每个人都得劳动，干个营生，总是有所专精。单独的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已经要比饱食终日的剥削者高明许多，凭群众的力量，用群众的眼睛、耳朵、脑子来进行创造或鉴赏，当然有无可比拟的力量。群众虽然很少直接进行艺术创造，但文艺史上一切伟大的创造都没有离开过群众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伟大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因他认识并肯定群众的力量，努力用艺术形象反映了群众的生活和斗争。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

孔丘轻视农业劳动，自然不足为训，但他没有自命样样精通，无所不晓，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后来韩愈说：

昔者齐君行而失道，管子请释老马而随之。樊迟请学稼，孔子使问老农。夫马之智，不贤于夷吾，农之能，不圣于尼父，然且云尔者，圣贤之能多，农马之知专故也”（《上襄阳于相公书》）。

韩愈是极口称颂圣贤的，这里就说“圣贤之能多”。但有时他也很赞赏专精。有首诗讲到精卫衔石填海：

鸟有偿冤者，终年抱寸诚。口衔山石细，心想海波平。渺

渺功难见，区区命已轻，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

小鸟想衔石填海，哪有成功的希望，别人讥笑它愚蠢多事，他独欣赏坚贞不渝、生死以之的专精。韩愈的《师说》其实是好文章，其中好处之一，在指出“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焉”，“是故圣益圣”，圣人其实并非天生；好处之二，在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都“术业有专攻”，“君子”瞧不起他们，其实“君子”才智远不如他们，他们倒是值得学习的（参看《师说》）。“术业有专攻”，群众各有其“专精”的所在，所以都有值得艺术家虚心求教的真本领。

苏轼记载嵩牛一事极有意思：

蜀中有柱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头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见《东坡题跋》）。

这件事古书中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记载，杜处士或作马正惠，戴嵩或作厉归真，也有作张伟良的，内容则都是笑画家画斗牛而牛尾高举的失真”（参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曾敏行《独醒杂志》卷1。齐白石《艺苑谈琐》也有类似记载）。名画家一旦脱离生活，陷于无知状态，就会失败。牧童、农夫对牛斗情状有真知，当然一眼就能看出牛尾高举的可笑。东坡从这里悟出：“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之不可改，《图画见闻志》所谓“虽画者能之妙，不及农夫见之专也，擅艺者所宜博究”，（《图画见闻志》卷6“斗牛画”条按语）都有尊重专精的意思。这些文人学士都有轻视奴、婢、农夫的一面，但他们也有主张艺术家应该向这些人的专精学习的一面。“能之妙”，指有熟练的技术，“见之专”，指认识生活的深刻，熟练

技术解决不了缺乏生活和认识肤浅这样的根本问题。古代评论家尽管其思想体系总的说来常是唯心的,但对其实践有素的事情,往往能提出符合实际的唯物见解,不能不加分析,笼统抹杀。

必须相信富有实践经验的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是最有艺术创造力的,同时也是艺术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艺术作品的好坏应由谁来评定,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也是我国古代一些优秀作家、艺术家早已在实践中认识到了的问题。以为某些脱离群众的文艺领导和文艺专门家才是真正的权威,而人民群众则不是,是十分荒谬的。

## 二 文艺领导、文艺专家必须 向群众学习,作群众的代言人

说人民群众最有艺术创造力,是最权威的评定者,并不是,也并不会削弱和否定文艺领导、文艺专门家的权威作用,只要他们不是脱离群众、藐视群众的。

传说宋朝的时候,四川成都每年春天都要“各求优人之善者,技艺于府会”,“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观众除官府外,还有大量普通男女百姓,官府也让这些普通男女百姓一道参加对所演剧目的评论。记载说:“每浑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座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有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这些官府可以兼看作文艺领导和文艺专门家,大量普通男女百姓当然是人民群众。评论一个剧目,“须筵中哄堂”,是说要领导点头;“众座皆噱”,是说要群众也批准;上下同笑了才算数。“较旗多者为胜”,老百姓人多,是否老百姓插的青红小旗要比官府多得多呢?若真是这样,则几乎等于群众说的算数了。大概不可能民主到这个地步,但总是相当民主的,因为允许群众投票,允许把群众投的票也算在总数里面。群众人多,如果群众不笑,只有官府里一些人在笑,即使不点

明旗数,恐怕也很难在场上通过罢。想不到宋朝成都地方这些官府,作为文艺领导和文艺专门家来看,倒还比当前某些藐视群众,把群众看成“群氓”的领导和专门家同志开明、因而也高明得多。

人民群众需要专门家,也承认有比个别群众高明的专门家。专门家是很可宝贵的,值得尊重的,但他们之值得宝贵和尊重,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那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而是因为他们能向群众学习,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使自己的知识充实、丰富起来,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代言人,而不是群众的主人、“下等人”头上的贵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的“专门”表现在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而加以综合和提高,真正的专门家不能脱离群众智慧的基础,他的专门才能来自群众智慧的集中。群众中的情况也是各色各样的。个别群众的话不一定正确,甚至像《祝福》中柳妈对祥林嫂说的某些话,还实在听不得。走群众路线也不是要求对任何群众说的话句句听,怎么说就怎么办。专门家应该正确反映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根本利益,对个别群众说的话进行思索、判断,“自己做主”(鲁迅:《而已集·读者杂谈》)。尊重这样的专门家,同尊重人民群众并不矛盾,实际是一致的。

我觉得,在春秋战国时期广为流传的伯乐,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人专门家。他擅长相马,只要真是千里马,能够驰骋沙场,即使正处在筋疲力尽牵拉盐车的困境中,他还是能把它识别出来。虽然传说是秦穆公的儿子,而竟长于相马,看来终是一个从群众中来的专门家。他的相马本领不可能从“空中楼阁”中来,没有长期丰富的实践功夫,不是集中群众的智慧,是不可能具有的。千里马原是常有的,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不过是韩愈的感憾,极言识才知贤、知人善任的人物是多么重要,多么难得(韩愈《杂说四》)。宋朝画论家韩拙提出过不少好意见,但他说:“骅骝骝,天下皆知其为马也,非伯乐一顾,就别冀北之骏而为良?”“马之无别,岂分骅骝骝之骏?……识马者,伯乐耳。”他以伯乐为例,认

为“贱隶俗人”，不会有评定艺术的本领（《山水纯全集·论观画别识》）。我以为韩拙其实没能真正懂得伯乐，并非伯乐的知音。

封建时代最高的统治者——皇帝虽然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头子，为了维护其统治，也有稍具远见、比较开明，能知一人之见不必尽善、察纳群言的重要，因而政治搞得较有成绩的。例如唐太宗李世民：

太宗皇帝好悦至言，……尝谓宰相曰：“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新唐书》卷132《吴兢传》引吴兢上玄宗疏中语）。

白居易也称赞过李世民类似的话：

臣闻三王之君也，无常心，以天下心为心；五帝之为君也，无常欲，以百姓欲为欲。颇其心以出令，则不严而理；因其欲以设教，则不劳而成。故风号无文而人从，刑赏人施而人服。三、五所以无为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后代反是，故不及者远焉。……岂不以己心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为欲，拂百姓以从一人之欲也！……臣又闻太宗文皇帝尝曰：“朕虽不及古，然以百姓心为心。”臣以为致贞观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白氏长庆集》62、《策林》7“不劳而理”）。

李世民当然不可能真“以百姓心为心”，但他没有“以己心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以己欲为欲，拂百姓以从一人之欲”，

多少是事实。白居易假借三皇五帝的名义,实际是主张皇帝“出令”,“设教”,都应顺从天下百姓的心愿。白居易自己是文人,所谓“出令”、“设教”,当然也包括皇帝对文艺的领导在内。

白居易还从而发出了皇帝必须广开言路,甚至还得接纳工商、士庶谏言的这一段向来非常著名的议论:

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视之而后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圣,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后圣也。若天子唯以两耳听之,两目视之,一心思之,则十步之内,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万枢之繁者乎?圣王知其然,故立谏诤讽议之官,开献替启沃之道,俾乎补察遗阙,辅助聪明。犹惧来未也,于是设敢谏之鼓,建进善之旌,立诽谤之木,工商得以流议,士庶得以传言,然后过日闻,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圣王,由此涂出焉。臣又闻不弃死马之骨,然后良骥可得也;不弃狂夫之言,然后佳谋可闻也。……(同上卷 67、《策林》70、“纳谏”)

这段话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不妨是这样:聪明的领导者,从来都是重视天下百姓的意见,愿意接受天下百姓的谏劝的。他们所说的“天下”“百姓”范围究有多大?当然不可能大到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群众”,但他举出了“工商”和“士庶”,又有“狂夫”,显然已不限于亲近大臣和一般士大夫,而是包括了若干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地位的中下层人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承认是相当广泛的了。

上面白居易这些话,一方面说明即使是封建皇帝,也有像李世民这样的人,能够知道全凭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违背群众意愿来办事是不对的。他出令设教,倒不全出于“长官意志”;另一方面,说明领导者只有比较尊重群众,察纳群言,才能变得稍为聪明一些,

而且察纳的范围越广,也就越有利。当然,与其说这些话是反映了封建皇帝的贤明,还不如说是反映了绝大多数封建皇帝的太不贤明,而白居易自己则的确相当深刻地看到了主观唯心主义领导的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不得人心,而从改革弊政出发,具有迫切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情况的民主倾向的。

类似白居易的这种议论,后来也是很多的。例如明朝吕坤就有不少精辟思想。

圣人尝自视不如人,故天下无有如圣人者。非圣人之过虚也,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其一方一智,未必皆出圣人下也。以圣人无所不能,岂无一毫之未至,以众人之无所能,岂无一见之独精。以独精补未至,固圣人之所乐取也。

愈上则愈聋瞽,其壅蔽者众也;愈下则愈聪明,其见闻者真也。故论见闻,则君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监司,监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民。

古之人,非曰位居贵要,分为尊长,而遂无可言之人,无可指之过也。非曰卑幼贫贱之人,一无所知识,即有知识,而亦不当言也(《呻吟语选》)。

他认为愈上者愈多壅蔽,如严重脱离群众,其见闻才智必然比不上普通老百姓。并不是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毛病,越不该被人议论,也不是地位越低的人越没有知识,越不该议论别人。所谓“以圣人无所不能”,在他实不过一句门面话,“兆民之众”各有其“一见之独精”,足可补所谓“圣人”之未至,联系他后面两段话来看,才是他的真意所在。吕坤这些话的民主性,是非常鲜明、突出的。

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我们有专制统治的历史,也有反抗专制、要求民主、争取民主的传统。民主可以被压抑,但不可能被消灭。什么时候政治上比较开明,民主空气稍为浓些,艺术上的民主也就多些,文学艺术便会出现繁荣的景象。政治上毫无民主时,文艺园



地必然萧条冷落，一片荒芜。秦王朝在历史上有其贡献，但文艺上成绩最少，与其极端专制有关系。

不管是政治领导、文艺领导、还是文艺专门家，一旦成了“一言堂”，不许众人言，一定要把自己说的一句话，甚至几个字，当作法律，或强迫别人尊重，不喜欢别人讨论、商榷，这就是一种“不好的风气”，至少“民主作风不够”。作为领导者，周总理说得最好：“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领导的意见符合实际情况，符合群众要求，能够反映客观规律，人们自然会尊重、执行。尊重、执行这种领导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是尊重、执行人民群众的意见。人民群众始终是文学艺术最权威的评定者，谁也否定不了这条客观规律。《水浒》自问世以来，不知被封建朝廷或地方长官用命令或条约之类来严禁过多少次，可是，始终未能如愿，老百姓还是喜欢看，人民从书中所写革命英雄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等具体行动中吸取教育，受到鼓舞，使封建时代的行政命令、“长官意志”终于只能成为废纸，无人理睬。可以说，这是这条客观规律不容违反的一个极显著的证据。

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而且已经三十年了。唐太宗、白居易、吕坤等人，都有许多局限性，是不必说的。我们今天的文艺领导、文艺专门家，至少总该不低于他们的认识水平，不再依照主观唯心主义的“长官意志”办事才好。

### 三 发扬艺术民主， 为繁荣创作提供必要条件

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90）。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三大艺术家之一里阿那多·达·芬奇这样说过：